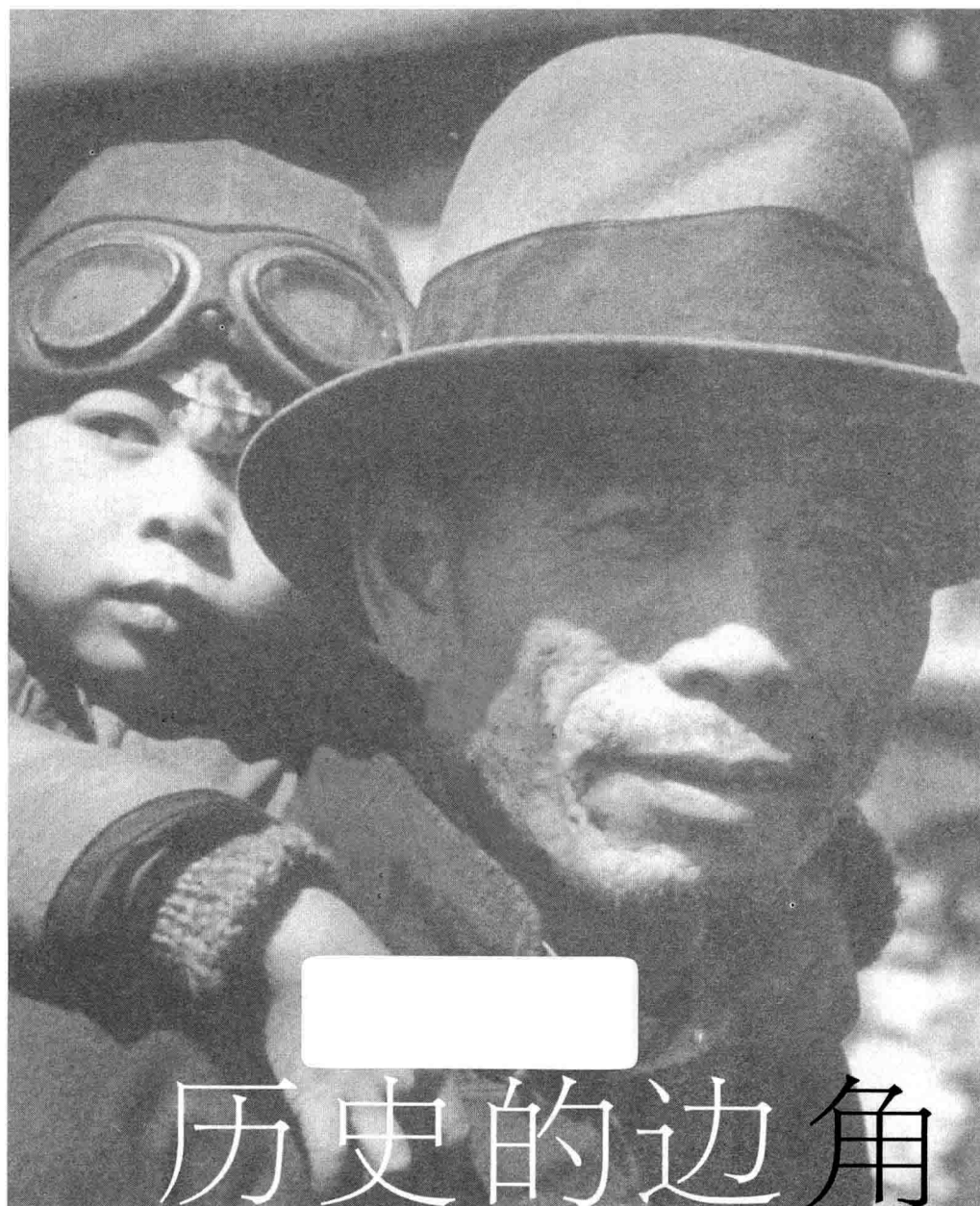




历史的边角

那些历史边角中的小人物，公共视野里，是见不到的……

小人物与北京

吉光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边角：小人物与北京/吉光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9
ISBN 978-7-5155-1132-0

I. ①历… II. ①吉… III. ①文化史—北京市—民国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81578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历史的边角：小人物与北京

作 者 吉 光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132-0
定 价 3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 (东区) 14号楼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书与人的相遇

记得某个出版社的广告语里有一句：“为了书与人的相遇”，就因为这句广告，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幻想会有机会到这家出版社工作。后来，终于还是错过了。于是，一直想写一本书，关于书，关于人，关于通过书认识的人，以及，因为一些人，才去读的那些书。

这本书中的人物，全是通过读书才得以结识的。他们离我们那么远，跨越了近百年的光阴；他们离我们那么近，他们就活在我们桌子上那些发黄的书页里。他们不是名人，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在众人面前说出他们的名字，可能一多半人会一愣：这个人是谁？他们不是改变历史的大人物，在类似大事年表的文件里，多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他们，只是在北京，在这座城市里生活过的一些人。他们读了很多书，做了一些事，也写了一些书。只是，因为一些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原因，他们被遗忘了，他们活在了时间之下。这其中，有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有的，是历史的无奈与悲凉——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被遗忘的。哪怕他曾经功高盖世，哪怕他曾经富甲一方，总有一天，他会被遗忘。人类在前行，身后是不断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

在博物馆工作久了，养成了一点点考据癖。对被遗忘的人和事有种超出寻常的兴趣。于是，读书识故人，成了习惯。书中写到的人，全部留下了自己的作品，作品中的自己，多半与历史教科书中的种种评价不同，当然，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也没有机会进入历史教科书。他们作品中反映的时代，也不再是教科书中那个冷冰冰的概念，甚至，其中多半的表述，与教科书找不到任何的联系。于是，在一本本的文字和图片

里，我迷失了，我能做的，只是记录。用一个个的故事，连缀起一个个鲜活的却又被遗忘的人生。

对书中记录的每一个人生，我都充满了敬意。我不愿说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因为任何定性的文字，都意味着对其中细节的忽略。我只是尽可能忠实地描述了那样一些人，在一百年前的北京，有的勇敢地接受了与以往经历过的不同的生活，并把这种新的生活与思考方式向更多的人传播；有的则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固守着城市的温情，让我们看到了兵荒马乱之外的生活的温度；还有的，多半是一些女子吧，在大多数人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代里，选择了不嫁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们不嫁，是因为她们守护着不可能瓜熟蒂落的爱情；她们不嫁，是因为她们守护着人生的希望。

我写下这些文字，怯怯地描述自己关于一本书的蓝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去。读书，不过是与逝者心交的方式之一。在匆匆相遇的路上，有的是过眼云烟，有的，却是一生知己。为这些没有机会谋面的知己留下一段文字，留下他们的故事，是理想，也是必须。故事，即将开始，我们一起期待。

目录

胡博·华士：洋画家眼中的中国	001
吴雷川：燕京大学的老校长	014
胡先骕：被遗忘的博物馆人	025
李蒸：身为校长	034
包贵思：燕京大学女教师的背影	045
刘之莱：历史转弯处的北京女孩	056
张次溪：齐如山之外的京戏与旧北平	064
金受申：北京，北京	080
陈墨香：荀慧生的御用编剧	092
杨晦：英雄曾经不那么沉默	100
赵清阁：老舍的视野之外	115
刘乃和：与他人有关或无关的一生	128
张开济与张永和：从民国到后现代	140
北京十年（代跋）	151

胡博·华士：洋画家眼中的中国

引子

2011年，我的工作单位首都博物馆展出了六幅晚清人物肖像。这批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名重一时的大人物——李鸿章、袁世凯、奕劻——而他的作者，则是一位已经无法在西方艺术史中找到名字的画家：胡博·华士。一位在中国鲜为人知的画家，他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究竟有何魔力，竟然能进入一个王朝的最高层，为慈禧太后、袁世凯、李鸿章、庆亲王等权贵画画？他眼里的晚清帝国最高层，究竟有着怎样隐秘的世界？

在历史的记录与重构中，我们到底记忆了什么，又遗忘了什么？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其中的参与者之一，竟是一位今天已经被美术史排除在外的画家。

名气超过梵·高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胡博·华士绝对是个陌生的名字。要是你知道，这位出生于荷兰的画家，一生曾为荷兰女皇、慈禧太后、朝鲜国王、俄国驻英大使等多国权贵画过肖像，那么你或许会对他产生兴趣。其实，围绕在这位画家身上的诸多谜团，至今仍令后人津津乐道。

毫不夸张地说，胡博·华士的早期经历就是一个标准的励志小说范本。1855年，他出生于荷兰的一个普通家庭，是家中最小的男孩，上



庆亲王像：慈禧太后就是因为看到了这幅画像，才下定决心请胡博·华士入宫，为自己画像

面有两个哥哥，父亲是一名旅行推销员。不过华士并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反倒酷爱美术，希望成为一名画家。然而，父亲的过早离世几乎打碎了华士的梦想，因为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谋生上。为了赚钱，他做过印刷工、出版人和书商。尽管日子艰辛，他仍旧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终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考上皇家美术学院，接受了画家让·波塔尔的真传。

不久，华士从布鲁塞尔前往巴黎深造，求学于法国著名历史画家费尔南德·柯尔蒙。那时，柯尔蒙创办了一个工作室，劳特累克、布莱特纳、马蒂斯与梵·高等画坛牛人都在此学习过。据一本梵·高传记

记载，梵·高在柯尔蒙工作室工作时，完全没有引起大师的关注，他一心学习肖像画，却始终没有得到柯尔蒙的青睐。在那本传记中，记录了梵·高对这段生活的回忆：“三四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柯尔蒙画室里，但是并没有找到我期望的东西。”而他的同门师兄华士在这里却如鱼得水。1887年，华士参加阿姆斯特丹的当代大师作品展销，其中两幅作品获得金质奖章，而这是梵·高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的荣誉。

从华士现存的作品看，与梵·高旋转的笔触、浓重的色彩、鲜明的个人风格不同，华士的作品体现了19世纪学院派肖像画的特点。即肖像是照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画家在作品中不体现个人的特点和画家本人的感情。这一特点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画家口中，被概括为现实主义。或许，正是其主流的学院派风格，一方面，在当时为华士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切实的利益；另一方面，当他过世时，他的作品被淹没在美术史的尘埃中，没有特点，成为他难以被后人记起的理由。

华士生平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代表荷兰参加了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1893年的美国，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大陆。美国的一切感染了这位远道而来的艺术家。在这里，他也收获了夏威夷公主的爱情。也许是这份远道而来的爱情带给荷兰画家重生的力量，婚后的1895年，华士开始过起了周游列国的生活，记录他所不知道的大陆原生态的肖像与生活。他先后到过夏威夷、香港、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然后取道澳门来到中国大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未知大陆的探索是美国知识界的主题。在芝加哥博览会后，美国有了第一个人类学博物馆，而这个博物馆的意义，在博物馆的创办人看来，就是在挽救正在消亡的文化和手工艺品。美国的人类学家说：“社会的进步无疑是一柄双刃剑。所有的人类群体也许都将最终达到文明的境地，成就自己的历史，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将失去自己的文化，最终败给科学。”而他们认为，中国，就是一块即将败给科学的处女地。胡博·华士来华，显然与人类学家这个多少有些猎奇的目的吻合了。当然，他笔下的中国，首先是上层的中国，作为一个由出版商转道而来的画家，他需要自己的作



满族男青年像：画面中男子显然保养得不错，与历史教科书中积贫积弱的晚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位女子的名字，当年也曾出现在画面上，可惜反反复复地修复掩盖了大量信息，而背景隐约可见的连环纹样，让我们不能不对这位女子的身份疑窦丛生。今天，借助仪器，还可以看到上海二字，也许，这是一副在上海完成的作品



这女子，名叫何纫兰，是福建水师中一位官员的女儿

品用最快的速度得到现实的回报。

1898年，胡博·华士来到了上海，华士首先见到了贫苦百姓和他一直想要描绘的小脚贵族少女。“自古苏杭出美女”。在礼查饭店，华士有幸找到了一位来自苏州上流社会的女学生做模特，以表现中国人心目中典型美女的形象。随后，华士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居住。这所大学堪称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吸引了很多达官显贵的子女前来求学。华士以该校学生为模特，进行油画创作。其中一幅肖像描绘了一位满族青年，白皙的皮肤、圆润的脸庞、轩昂的表情，使他有别于清末穷苦百姓普遍具有的羸弱形象。当我在展厅里看到这段说明文字与墙上的作品对照时，多少有些疑惑。在题为苏州女生的作品中，画面背景隐约可见的连环纹样，在今天画家对晚清民国的描述中，是少见的。而且，对方的身份还是一名女学生——如果真的是女学生的话。因为，在晚清的小说中，连环纹样很多时候是青楼人家门帘的图案。到底哪一个更真实？如果胡博·华士真的描绘了苏州上流社会的女学生，那么我们的美术史和民俗史又当如何修正？如果画家错了，那么，是不是隐隐说明，女学生，永远是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的民族的时尚？

在华士的作品中，还有一位福建水师的女儿。展厅的说明文字这样写：“……华士夫人精心安排她到家中做客，而华士则迅速捕捉了这名女孩进门时的婀娜仪态。”在展出的作品中，在每幅作品的右上角，都有画中人物的姓名，通过专用手电的反复寻找，我找到了这位女生的名字，“何纫兰”。这位何姓女子，到底是哪位大人物的千金，他的父亲，在福建水师中到底有怎样的地位，才能够迎接一位来自异国的画家？而在女子不抛头露面的时代，他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允许一位来自异国的陌生人，大胆地描绘了女儿的面容？这些问题，我真的没有来得及一一考证，但是，胡博·华士的意义在于，他描绘了活生生的中国，哪怕是最表层的。如果把这些作品和这一时期西方版画中的中国做个对比的话，胡博·华士，至少，让中国在西方，活了起来。



袁世凯像：这可能是存世的袁世凯的影像中，最意气风发的一幅

华士笔下的袁世凯和李鸿章

一个外国画家，究竟是怎样进入清王朝的“心脏”呢？其中的故事颇耐人寻味。据华士在日记中说，1899年初来到天津后，他得到了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的挪威人诺曼·穆泽的帮助。诺曼是一个“中国通”，参加过甲午战争，在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中当军事顾问，负责训练骑兵，设计军服。在诺曼的引荐下，华士见到了袁世凯。

在日记中，华士记录了他所见到的袁世凯、义和团以及晚清纷乱的政局：“袁世凯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满洲里人，他不仅是总司令，还是



李鸿章像：从画面尺寸看，这显然不是最后的完成稿，但完成稿可能已不在人世

总督，后来成为第一位中华民国总统……空气中酝酿的紧张气氛不断升级，起义迫在眉睫……虽然指挥官是我们的朋友，但普通的中国士兵却有可能非常希望我们到天国报到。”

时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军中弥漫着浓烈的反洋情绪。诺曼怕华士受到伤害，几乎跟他寸步不离，睡觉时手里也握着枪。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却待华士为座上宾，每天上午抽出一段时间给华士当模特，让他画像，这或许出于他对身边外国将领的信任。要知道，在晚清，大多数人认为给人画像是个不吉利的，画像会带走人的灵魂。袁世凯的肖像油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画成的。最后当袁世凯看到自己的画像时，

感觉非常满意。在这幅油画中，适逢39岁的袁世凯目光炯炯有神，虽然嘴唇紧闭，却难掩意气风发之态。这与我们后来常见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正襟危坐、表情肃穆的照片判若两人。绘画时，袁世凯刚经历了戊戌政变，从无名小辈崛起为壮年政治家，这幅油画也是他当时唯一的真实形象，可谓弥足珍贵。1906年的《纽约时报》报道，袁世凯后来还想让华士给他画一张军装像，而且已经把军装寄到了美国。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那套军装，而华士是否完成了袁世凯的军装像，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在展出的六幅作品中，有一幅李鸿章的肖像，没有考证出作画时间，尺寸也很小，与李鸿章在晚清的重要地位不成比例，这显然是一张习作。一位晚清重臣，到底有多少时间留给一位异国的画家？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要知道，完成一幅人物肖像即便是素描稿，至少也要一天的时间。李鸿章有记日记的习惯，当我翻遍了所有的《李鸿章日记》后，没有找到他对于画像一事的记载。也许，公务缠身的李鸿章觉得画像是小事一桩，与军国大事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也许，更有可能的是，胡博·华士根本没有见到李鸿章。非常凑巧的是，在安徽省博物院的展厅里，曾经展出了一幅李鸿章的老照片。照片上的神态，衣服的纹饰，与首都博物馆展厅中的李鸿章像如出一辙。会不会就是根据这张照片，胡博·华士描摹了心目中的李鸿章？

一百多年后，博物馆所能展现的，只能是片段。

1905年，为慈禧画像

袁世凯的肖像成功后，华士就梦想着让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或朝廷大员成为他的模特。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中国人迷信地认为，如果面貌让人如实地画下来会很不吉利，而且紫禁城也不会让外国人轻易进入。但华士知难而上，积极奔走于各国驻华使馆，请外交官们帮他牵线搭桥。最终，还是好友诺曼·穆泽的努力起了作用。通过他

的穿针引线，再加上华士和手眼通天的袁世凯建立的亲密关系，前往大清紫禁城的大门已经为华士洞开。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庆亲王奕劻接受了华士的请求，耐心地给他做了模特。

据后来学者的考证，华士的画作都留有副本，即画作一式两份，画家和模特各保留一份。现今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六幅作品，都是画家手中保留的那一份，而模特手中的那一份，伴随王朝的覆灭和岁月的飞逝，早已不知去向。

奕劻像的成功，为胡博·华士与慈禧的接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5年，华士接到一个特殊的邀请，邀请来自清朝外务部（前身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他为外务部官员画像。华士并不情愿，故意开了一个高价，没想到外务部竟一口答应。

同年6月，华士到达北京，等待他的则是一个更大的惊喜。当时的外务部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伍廷芳悄悄告诉他，这次的油画模特是70岁的慈禧太后。后来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华士开玩笑说，“应该要两倍的价格”。

事实上，1903年时慈禧曾做过一位美籍女画家的模特。那位女画家画的肖像画后来赠给了美国政府，现藏于华盛顿国家博物馆。

1905年6月20日，华士第一次觐见慈禧，地点在紫禁城的西苑，但他自己并不知道绘画的地点。他后来回忆说，他是从兵部衙门随同伍廷芳和载振前去画像的，“走入城关，看到荷塘环绕花园，乘小船进入，而后在殿宇中等待太后的到来”。后人估计，华士作画的地点是中南海，在当时慈禧经常居住的仪鸾殿附近。华士回忆当时“光从左侧射来”，慈禧端坐在一把金座椅上，身后两名太监举着巨大的宫扇，两旁还站立着12名太监。慈禧给画家的时间颇为苛刻，只有四次，每次近一个小时。

华士先是赞美了慈禧的面容，“亲切美丽，流露出坚定的意志，我立即就喜欢上了她”。慈禧提出了很多“要求”——面部不能出现阴影；眼睛要画大一点；嘴部要显得丰满，不能下垂；双眉要直，鼻子不

着任何阴影……“总之，不要阴影、不要阴影、不要阴影，也不要皱纹！”华士后来在信中向亲友抱怨。

华士从来不会改动自己的画作，于是他回到自己下榻的旅店兼临时工作室，倒了几杯威士忌，问自己该怎么办，最后决定妥协。

华士正是根据慈禧的要求完成了第二个小样，最难得的是牌匾上的几个中国字，据说华士画了很长时间，最后发誓说，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相信是他画出这些字的。小样先经过载振等人的审阅，感觉满意后再次转交慈禧。

当华士把绘制的肖像小样交给慈禧审阅的时候，出人意料的是，太后竟然用英语评价道——“Good！”慈禧说出这句英语并不奇怪，此前她曾多次问过当时担任外务部右侍郎的伍廷芳，英语中“好”字怎样说。不过，也许由于潜意识的作用，她从来没有问过英语里用得最多的两个词汇——“谢谢”和“对不起”。不管怎样，说“Good”，证明慈禧对这幅画十分满意，但还是“鸡蛋里挑骨头”，提出了几个小意见。

这一次，慈禧又提出眼睛要向上睁开一点。这样，再次修改的小样才成为后来颐和园保存肖像的蓝本。从这幅蓝本可以看出，这些修改意见都得到了充分的响应。华士也明白，慈禧并不是如自己所推测的那样想要一张完全真实的画像。

两个多月后，画作终于完成，由于各种苛刻的“要求”，慈禧太后被“成功地绘出了一个30岁妇人的容貌”。华士得意地说：“我的名字将会重复出现在中国的史籍里。”如今，这幅油画藏于颐和园，画中的慈禧坐在硬木靠椅上，面目平静，神态安详。

如果到颐和园参观，在德和园里可以看到这幅镶嵌在落地镜框里的油画，高234.5厘米，宽144厘米，画中的慈禧坐在硬木靠椅上，透视合理，栩栩如生，显得保养极好。2007年专程从荷兰赶来修复这幅油画的文物专家安娜·范·格里文森评价道：“几乎可以感到太后脸颊上脂粉的质感。”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认为这是慈禧油画肖像中最为真实准确的一幅。

1905年12月5日，回到美国的华士心有不甘，决心以那幅慈禧的初稿为基础，完成一幅完全写实的慈禧肖像画。两个月后，他终于画完了。这幅油画在中央公园的画室向公众展示。画中的慈禧完全没有德和园所存油画中的慈祥温和，而是带着咄咄逼人的表情。展出中曾有报刊评价此画——“最佳处就是双眼，让人直视片刻就不得不闪避开，仿佛这位东方的太后就在你的面前，肆意燃烧着她的权势和淫威。”这幅画现存于哈佛大学福格美术博物馆。

有意思的是，把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所藏的华士绘制的慈禧太后像与中国颐和园保存的慈禧太后像做个比较，就会看出，在中国保留的作品中，画家按照慈禧本人的意愿对画像做了不少修改——减少了她脸上的皱纹，重新勾勒了嘴唇的曲线，对面部阴影渐渐隐去……在这幅画作中，呈现了一个慈祥而不失威严的慈禧太后。

在慈禧太后的作品完成后，为了揽到更多生意，华士继续留在中国，并前往北戴河游览。他在日记里记录了他眼中的中国：“四分之三的房屋被传教士们所占据，居住在石头围墙后面的人们拥有网球场、浴室、花园，他们收入丰厚，但也有丑陋的妇女、成群的孩子，以及骄傲自大的人……中国人很贫穷，道路都被挖坏了，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乘轿子或者骑驴。铁路线都有外国军队警戒。”

在华士看来，北京的政治局势就像一场利害关系复杂的象棋比赛。外国使节们编织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疯狂地瓜分任何陷入其中的蝇头小利，并彼此偷窃他人所得。在第三方中国的领土上，列强彼此混战，希望获取更大的利益。如果把这番话和1900年前后中国作家在《孽海花》中描述的内容做一比较，就不得不惊叹华士表述的准确和精致。

后来，华士赶赴朝鲜，为当时的朝鲜末代国王高宗李熙画像。等他回到纽约后不久，日本入侵朝鲜，国王遇害，“他也带回了作品的副本，是现存的唯一的朝鲜末代国王的影像”。

晚年的华士再也没有做过长途旅行，此时他经常画的对象是慈禧太

后赏赐给他的家具和瓷器。1935年，华士因患肺炎去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后，那些带回纽约的画作都被他的儿子所继承。

一个世纪后的胡博·华士与北京

华士留给儿子的画作一共有34幅。后来，华士的儿子又将这些油画传给孙子休伯特。在展览的前言中记录了休伯特看到的油画的样子：

“我看到的时候那些画颜色已经发黑，还生了很多虫子。我父亲只是随便地把它们堆在一起，画室也被人破门入室，已经被偷了很多东西，不过那些画估计因为太破旧所以无人问津。”而休伯特的母亲认为，这些画作已经和垃圾无异，建议就地扔掉，但休伯特认为，那些东西上有家族的记忆，坚持要把它们运回美国，保存在车库里。有些人死后才会出生；而有些人，死了就是死了。祖父生前的盛名，恐怕他同名的孙子完全没有听说，即便有所耳闻，可能，他也不会想到，这些发黑的作品中，记录了一个世纪前，东方世界最高层的生活。

这些画重见天日也是因缘际会的结果，休伯特说：“我自己做一些小生意，我的公司里有位会计，他有一次到我们家来，在车库里看到了这批画。他的德国裔岳父是很高明的油画修复师，听他说了有这批画的存在，就要求来看一看。”

那位修复师很惊讶地发现，这些画用的画布和油彩都很高级，“我的会计就跟我请求，能不能让他的岳父来修复这些画作，因为岳父退休住在他们家，语言不通，生活寂寞。我就答应了。他的岳父花了2年时间，修复了30幅作品，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美丽的画，都是他工作的成果”。其中，就包括那6幅晚清人物肖像油画。2010年，华士的后人远赴重洋，将这6幅晚清人物肖像油画捐给了首都博物馆。

而那幅慈禧太后像，一直保存在颐和园，80年代，画家戴泽受邀请重新临摹了这幅作品。这位40年代北平艺专的毕业生，一位当时已经年过古稀的老者，就这样，和一个世纪前一幅不算一流却也无可取代的艺